

《武林坊巷志》及其编纂者

吴 启 寿

杭州为历史名城，自唐以来，素称繁华之区。以其滨临钱塘江，古称钱塘；以其有武林山，故亦称武林。历经五代、北宋，其经济、文化之发达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宋晁补之钱塘《七述》云：“吴越之有东南，实国于杭”，“宫室之丽，复殿重楼，犹有存者，其始也。”南宋建都，更是人才云集，文明益焕，文物典章，都城经济，盛极一时。城内街市、坊巷、寺观，半因旧有建置，而增城溢郭，则多半式照旧日东京规模，官府名园，星罗棋布，民庐坊陌，鳞次栉比。故有云：“鸾翔凤翥枕江流，秀夺江南第一州”。（元贡性之诗）

浙江图书馆藏有《武林坊巷志》稿本，备载旧时杭城坊巷、官府名园、风土人物之盛。

《武林坊巷志》亦名《杭城坊巷志》，草创于晚清杭州著名藏书家丁丙，成于同里孙氏寿松堂后人孙峻。原稿本五十四册，另有志目及总目录一册，引用书目韵编一册，约三百数十万字。

“纵横八百目，上下一千年”，自宋至晚清，系统地收集杭城诸坊巷之沿革及遗闻掌故，集杭城史事之大成，洵足称传世之文献。

浙馆所藏《坊巷志》有初稿本、誊清稿本和节录稿本三部，其内容文字之详略各不相侔。孙氏稿本称八十卷，实未分卷，原

五十七册，解放前失去三册，现存五十三册，厚薄不等，系经孙峻增订续辑之稿本。内容较为充实完备。以绿格毛边纸端楷抄写，其中亦有行书或行草，字体清晰可读。俞樾为作序^①冠于首；丁丙、孙峻二氏各有自序^②。孙序称有凡例，今未见。

又一部为十七册，未分卷，系孙氏节录稿本，与前书五十四本比较，内容简略，前失去三册，此本大体有之，约略可补前书之缺佚。

以上两部稿本，原系孙氏家藏，孙康侯先生去世后，经作者故友，山阴樊漱圃先生热心周旋，由孙氏哲嗣昆季捐赠给浙馆。樊先生当时著文记载此事^③。

另有稿本五十四册，未分卷次，前无序目，不但纸色不一，且有用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纸抄写者，也有用杭州纸料纸抄写者；又有以裁取印本钉入者，细字密书，行草各具，上下互乙，涂改错出，浮签飞页极多；且有但标来源，留候补录，或承友朋写示，随意裁糊，而失记出处者，亦比比皆是。此当为丁氏手稿无疑。

此外，有《杭城坊巷志》（节要）铅印本二册，陆启节要编订，载一九二六年《浙江商报》（自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），连续刊登147期。此节要本，是作者当时剪报汇辑成书，亦是孙氏捐赠浙馆。早期报纸，亦很难得，外间已绝无流传。

杭城之志书始于南宋，有乾道、淳祐、咸淳临安三志。明有田氏《西湖游览志》，备载湖山掌故，成书于万历。自此以降，明清二百余年间之史事，则无可徵考。至于一统之巨编、两浙省志、府志，载其大者而细者遗之。若《东城杂记》、《西城杂记》、《北隅掌录》、《湖山便览》等，非域于一隅之记载，即兼详郭外，湖山歌咏，登临凭吊，浩漫无际。

考杭城坊巷之有志，清乾嘉间，仁和朱朗斋^④、胡次瑤^⑤先后辑有《武林坊巷志》，但其稿早已散失，丁氏曾多方求访，终

未得见。据丁丙自序云：“先次瑤君而采辑录者，则有张东溥暘之《武林志余》，施亨午干之《约略说》，皆分坊条缀，杂载事实，虽得残帙，不足续补也。庚午冬，见王松溪乡试行卷，履历之下继以著作，有《杭城里巷考》、《湖墅旧闻》，急索其稿，松溪笑曰：“我姑以列其目，实未有书耳。”于是，归寻胡氏绘旧图，按图排目，若街、若坊、若巷、若衢，都八百余条；稽之图志，证之史传，下至稗官小说，古今文集，靡不罗载。”

历来之游览志或掌故录，多是“广衍数十里”，且兼采“模山范水，登临凭吊”之文，而丁氏之所探，仅限于城内，南不及凤山，北不及皋亭。主张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惟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生本不贤，甘于识小。”凡乡邦文献，事迹虽小，务求忠实，予以采录，为之阐扬；而道听途说，于文献无徵者，则弃舍不述。从丁氏该志体例看，即以坊巷为主体，分坊条缀。大体是记地、记事，并记人物。凡城内之名园、古迹、桥梁、第宅、寺观、古今人物，以及有影响之事业，事无大小，皆搜罗无遗。如南睦亲访书籍铺陈起等事，以往史志皆不载，而《坊巷志》则网罗备致，考订甚详，洵以补志乘之未备。

俞曲园序对该书推崇备至，云：“宋敏求之《长安志》，凡长安之城郭、官府、宫室、寺观，纤悉毕具，其坊市曲折，及唐盛时士大夫第宅所在，一一能举其处，粲然如指诸掌，精博宏瞻，非他志所能及。……杭州自唐以来即称最胜之区；南宋偏安于此，尤极湖山歌舞之盛。……丁君松生，博学多闻，家中藏书为我浙冠，尤留心杭郡掌故，所著《杭城坊巷志》之作，每见必怱怱其速成，而载籍极博，编刻为难。丁君谦挹，未敢遽出其书，又属之孙康侯茂才，使卒其业。今年余来湖上，康侯抱书来见，则哀然成书矣。其书以太平坊建首，盖以南巡行宫在焉，尊尊之义也；次之，自西壁坊以下，鳞罗布列，若网在纲。博采群书，参稽志乘，无一事不登，无一文一诗不录。城郭、官府、宫室、

寺观，坊市曲折，及士大夫第宅，无不备载。视宋敏求《长安志》无多让矣。”他认为，《长安志》是记载盛唐长安古都景物遗迹；而《武林坊巷志》则是记载自唐及南宋以来都会的盛事旧闻，同样是精博宏瞻，为一代文献巨著。

《武林坊巷志》编撰者丁丙，字嘉鱼，号松生，晚号松存，钱塘人，清诸生。生于道光十二年，卒于光绪二十五年。终身以图籍自娱。家富藏书，有八千卷楼，名闻海内外。著《善本书宝藏书志》，学者称其“上窥四库提要之博，下兼黄氏士礼居之长”，在书志中是较有影响之书。

《武林坊巷志》的纂辑年代，据丁氏《年谱》称：“同治十一年十月始辑《武林坊巷志》。”而在本书自序中则云：“同治甲子（三年），搜得胡君次瑶旧绘省城坊巷图，访胡君手辑坊巷志稿，不能得。”可见纂辑坊巷志，已早在筹划中之事。纂辑前后，计约十年时间。发凡起例独出于丁氏之手。“虽晨抄暝写，时作时辍”，其间不无难处：收录范围、资料之取舍；“片楮之间，或为盛，或为哀”，人事之劝惩等等。正如孙康侯所云：丈插架虽雄，望古云瑶，老成凋谢，请益无从；里老语言，亦渺不可追，如敬恭桑梓何？粗翻简编，随手杂记，积久汇集，渐能贯串，至光绪八年，草册已渐盈。其间，为补钞文澜阁书设局东城讲舍，文事往来日繁，千头万绪；且因年事已高，精力所致；“丁亥初冬，家孟溢焉而逝”^①，使其无心论古，辍笔纂述，乃托寿松堂后人孙氏康侯，就八千卷楼，继续编纂，使之成书。

《坊巷志》续辑者孙峻，字极于，号康侯，杭州著名藏书家孙氏寿松堂后裔。生于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卒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。以其家学渊源，幼年好学，为丁松生所重，往来于丁氏八千卷楼，襄助编纂《善本书宝藏书志》和《武林掌故丛编》等巨著。丁氏称之“雅有同心，勤于著述，因举丛编郑重付

托。”按孙峻自序中所言：光绪十五年春，获睹松生丈《杭城坊巷志稿》。此时孙峻尚二十一岁，正是英年好学之时，受丁氏之重托，按册以来，承丁氏纂辑之先绪，往来于名公硕彦之间，假其楼藏书之富，汲古搜今，博采群书，网罗放失，“泛览志乘，未尝不思由于及支，从原而竟委。”孙氏精于簿录之学，尤谙于杭郡掌故。清季曾长文澜阁，与孙树礼纂有《文澜阁志》，其他著述亦甚富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有《仁和县志稿》、《天竺续志稿》、《武林文献内外编》、《孙氏家集》、《重宴鹿鸣姓氏录》等有关杭郡文献多种，多数为未刊稿本，均归浙馆所藏。其于《武林坊巷志》之纂辑，“春秋八易，寒暑载更”，其间数易其稿。表潜阐幽，拾遗补阙，匡谬纠瑕，考订异同，多出于孙氏之手。俞曲园称其“博采群书，非丁君之博洽，不能创于前，非康侯之精心锐力，不能成于后。”这个评论是十分得当的。

《坊巷志》稿自问世以来，即引起许多学者重视，早在民国十五年，陆启在《浙江商报》上连载《杭城坊巷志节要》，即以此为底本。浙馆收藏稿本以来，每年接待了数以百计的读者，特别是研究杭州史地的学者，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资料。民国二十年，张慕騫撰《谈杭城坊巷》即取材于此；钟毓龙撰《说杭州》一书，许多章节皆以《武林坊巷志》为依据。而在有关文章中，引证片段之文，更是不胜枚举。解放后，本馆更为重视，曾为编制《杭城坊巷志人名索引》，1963年付印，以便读者查索。而今后在建设社会主义“四化”中，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，为文史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史料。

《武林坊巷志》为杭城文献巨编，网罗史料宏富，然而，其中不免有纰缪抵牾，或有空存名目之嫌，但绝不影响该志流传和使用价值，乃有待于有志杭郡文献之士，详加考订，纠谬补瑕之必要。

注：

①俞樾序载《春在堂杂文》六编卷七。

②丁丙序载《浙江通志馆馆刊》一卷一期；又与孙峻序同载《文澜学报》二卷三、四期合刊。

③樊镇跋《纪念杭州耆旧孙康侯先生》文：“仁和孙公康侯，于夏历乙亥（1935）冬十二月初八日，以病终于家。越一日，余以弟子礼往吊，泪雨落不可掩……孙公哲嗣君木、君恒昆季，以其父有文誉，将所遗诗文集及《武林坊巷志》稿本等若干种，悉捐赠浙江省立图书馆。盖其先人手泽所存，至足宝贵。守之私家不若存之于公之可以永其传，而免湮没也。……丙子春正月杪山阴樊镇跋于杭州。”（《图书展望》第1卷第1期，1936年2月）。

④朱朗斋，名文藻，字暎濬，朗斋其号也。仁和人，乾隆诸生，精于簿录及金石之学，清王昶《金石萃编》多为之校正，有《振绮堂书录》及《金鼓洞志》等书。（见《武林坊巷志》第三十七册）。

⑤胡次瑶，名琨，字美中，胡敬子，仁和人，道光甲辰举人，候选教谕。朱朗斋旧著《武林坊巷志稿》藏其家，复加补纂，十载而书成，先绘杭城坊巷图，尺幅中全城毕备。诗文多不留稿，别著《焚香山馆丛述》若干卷，庚申毁于兵。（录自《清代杭人小传》稿本，浙馆藏；又《坊巷志》第二十六册亦详载其事。）

⑥家孟，即兄长丁申，光绪十三年丁亥十月去世。见《丁丙年谱》卷三。

